

語言復振的理念與實務

家庭、社區與學校的協作

張學謙◎著



新新台灣文化教育基金會

語言復振的理念與實務

——家庭、社區與學校的協作

張學謙 著

新新台灣文化教育基金會 出版

語言復振的理念與實務

家庭、社區與學校的協作

2011年4月15日 初版發行

作者	張學謙
發行人	張啓中
出版者	財團法人新新台灣文化教育基金會
地址	台中市 402 南區仁和路 191 號 2 樓
電話	04-2285-1172
製作	金華排版打字行
電話	02-2382-1169

總經理	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總經理	洪詩棠
法律顧問	曾榮振律師
地址	台北市 100 重慶南路一段 121 號 5 樓之 11
電話	02-2382-1120
傳真	02-2331-4416
網址	http://www.hanlu.com.tw
信箱	hanlu@hanlu.com.tw

ATM 轉帳	107-540-458-934 中國信託城中分行（代號 822）
郵政劃撥	15718419 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加入會員，直購優惠。

書局缺書，請告訴店家代訂或補書，或向本公司直購。

定價 新臺幣 300 元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語言復振的理念與實務：家庭、社區與學校的協作 / 張學謙著. -- 初版. -- 台中市：新新台灣文化教育基金會出版：翰蘆圖書總經銷，2011.04
面：15×21 公分
ISBN 978-957-29750-8-4（平裝）
1. 臺灣原住民語言 2. 母語 3. 語言政策 4. 文化
803.99 100005929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倒裝，請寄回更換）

自序

正在失去族群語言文化的社會，有人曾比擬為，如感受牙疼般的痛苦。牙痛令人坐立不安，需要趕緊治療。語言流失也常被形容為「溺水滅頂」，弱勢族群學生在語言學習過程中，經常被推下只有強勢語言的游泳池，在母語橫遭排除、歧視的情況下，強勢語言學成了，母語卻溺水而亡。

喪失母語，不僅像齒牙動搖、神經抽痛般狼狽，更有身溺水、求救無門的絕望感；語舌遭受禁錮的族群，社群生活必然也受到制度上不人道的對待。十幾年前，夏威夷大學因為經費緊縮，打算縮減夏威夷語的課程，此舉引起原住民的抗議。原住民將學校行政大樓團團圍住，高喊：「不能把我們的舌頭（母語）割掉！」捍衛母語就像診治牙痛，搶救溺水以及護衛我們的舌頭一樣，刻不容緩。

本書可以看做是，謀求家庭、社區與學校三位一體的「母語求生術」的思考結晶。我從最基本的，家庭如何鞏固母語的衍續出發，然後邁向社區與學校的協作，再從社區與學校回歸家庭，促進族群母語的世代傳承。家庭、社區與學校同步架構環層密實的「母語防護圈」，而母語防護圈彼此扣連而非各自獨立，同時所有的母語復振作為，都要能強化族群母語的永續命脈。

所有的研究都必然跟研究者個人的背景和生命史緊密相連。我在大學時期，受到張鈺齡、郭士行以及林清祥教授的母語意識啟發，讓我清楚的認識到母語是資源、也是權利，母語教育不但能讓學生認同自我族群、提升尊嚴，更能賦予權能（empowerment），將削減式的雙語現象，轉為增益式的雙語現象。

在東海大學就讀期間，我受到鄭良偉教授的《演變中的臺灣社會語文：多語社會及雙語教育》一書的影響，開始關心台灣的社會語言議題。大學時代以《大學生對語言與語言政策的態度研究》（Attitudes toward Language Varieties and Language Policies）為題撰寫學士畢業論文，這篇論文後來發表在第一屆台灣語言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大學畢業後，我到夏威夷大學跟隨鄭良偉老師從事語言學研究。鄭老師強調語言學社會關懷的面向，時常告誡我，不要只是動腦做研究，也要起而行，動手實踐信念。鄭老師自己身體力行，組織草根性的台文讀寫班、培育母語師資、鼓吹制定官方多語政策與雙語教育。鄭老師對語言權利法制化的堅持，也影響到我後來從語言人權的觀點，追求符合公平、正義的語言政策實踐。這條路可以稱為「由上而下」的政府路線。

「由上而下」的政府路線通常透過法律制定語言使用的權利與資源。在這一方面，我曾參與「語言公平法」的制定，也從語言人權的角度撰寫過好幾篇支持語言平等、語言權利政策的文章。「由上而下」的政府路線並不容易走，弱勢族群通常無權無勢，要影響語言政策談何容易，另外，最大的問題就還在於政府路線通常不會照顧到家庭和社區的母語傳承，而這兩者才是語言復振的關鍵。

在夏威夷大學就讀博士班期間，應施正鋒教授之邀，撰寫紐西蘭的語言政策，開始閱讀弱勢族群語言復振的相關文獻。我在那時候接觸到菲什曼（Fishman, 1991）的「挽救語言流失理論」，他的理論主要包括維持和超越雙言社會（diglossia）這兩部份，特別重視回歸家庭與社區的母語復振。我把這種強調自我掌控、自我賦予權力的語言政策，稱為「由下而上」的家庭路線。這也是本書的基本主張：自己動手，在家庭與社區復振母語。

本書主要論及自力救濟式的「母語求生術」，主張母語復振應當有草根的力量支撐。當然「由上而下」的政府路線及「由下而上」的家庭路線，都是弱勢語言復振所需，不過後者應當優先處理。我比較推薦家庭路線的理由是：家庭的母語傳承，很容易自己動手做，不必等待法律通過、也不必等母語教材編好，只要家長會說母語，就能在家庭建立母語的傳承的基地。我自己培養小孩母語能力的經驗，讓我確信家庭才是最根本的母語傳承基地。這本書的第一部份就是運用語言行銷，宣揚維繫家庭母語的方法以及母語帶來的各項好處，希望能促進家庭母語的世代傳承。

家庭與社區外，學校是另外一個重要的母語學習的場所。本書的第二部份，嘗試從家庭、社區與學校的母語教學促進母語復振。2001年開始實施的母語教學，至今（2011年）已經十年了。可惜的是，近年來社會語言學調查顯示，台灣族群母語還是持續流失，單靠學校的母語教育顯然無法保存母語，當務之急是重新構想學校母語教育，結合家庭、社區與學校，統整母語支援系統，提供兒童全方位的母語學習和使用的空間。

這本書收集我近年來有關語言復振的論文，分為兩個部份，共八篇論文。除了第一章導論是新撰外，其他都曾發表在期刊或是專書論文，這些論文都經過不同程度的改寫和編輯。本書倡議「由下而上」的母語復振模式；我認為母語除了應當在學校進行教學外，也要回到家庭與社區，透過結合兒童在家庭、社區與學校的語言社會化，建立母語的實踐社群。我主張最重要的是維繫家庭母語的世代傳承，母語教學活動可以採取多種方式進行，重點是需要結合家庭與社區並強調語言意識的啟發。

本書得以完成，要感謝我的爸爸和媽媽，從小就教我感受母語芬芳的滋味；也要感謝鄭良偉教授的教導——永遠要為弱勢的母語代

言，那不僅是義務，更是責任。另外，本書的完成要感謝國科會（「運用語言行銷法在學校、家庭與社區推展母語」，NSC91-2411-H-143-005）、行政院客家事務委員會及原住民族委員會的學術研究補助。

是為序。

目 次

自 序	i
第一章 導 言	1
上篇：家庭與社區的語言復振	
第二章 挽救母語、從根救起	
— 家庭與社區為本的語言復振	35
第三章 語言行銷的理論基礎及對弱勢語復振的啓示	81
第四章 語言行銷之理念與實踐	
— 以台東池上客語復振為例	115
下篇：語言教學與語言復振	
第五章 融入語言人權的弱勢語言教育	
— 批判教育學的進路	145
第六章 將母語帶出教室外	
— 家庭、社區與學校的母語統整教學	181
第七章 重新點燃族語火種	
— 師徒制與原住民語言復振	217
第八章 邁向母語優先的學前語言教育	
— 全母語幼稚園與語言復振	241
參考書目	279

第一章 導言

壹、前言

有個故事這麼說：「有一個人在河邊散步，發現有人溺水，正從上游流下來，在河裡大喊救命。他就趕緊跳下水救人，救起後，施以急救。但是，沒多久又有人在河裡載浮載沉，大喊救命。這個人又下水救人，想不到越來越多人從上游溺水，急需援手，先前溺水被救起的人，清醒之後，也加入搶救。雖然，努力的搶救，還是不斷的有人從上游溺水，載浮載沉漂流而下。這群人慢慢發現到，這樣不斷的搶救，於事無補，就決定到上游，找出溺水事件的原因。」母語流失就像是有人溺水，在河裡漂流命在旦夕，需要立即展開救援行動。

如果把母語流失比喻為「母語溺水」，我們可以追問：到底是什麼人、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如何把母語推下水，使之在水裡載浮載沉、甚或溺斃？有什麼方法可以有效的抑制母語流失，促進母語復振？如果母語跟過去一樣，還是在河裡載浮載沉，母語的「救生圈」在哪裡？救上岸之後，如何施以急救，使之重獲生機？這些「語言復振」（language revitalization）或「挽救語言流失」（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RLS）的相關問題，就是本書主要討論的議題。

語言死亡的原因有很多，對弱勢族群而言，有兩個最嚴重的致命傷（張學謙，2004b）：首先，會說母語的家長，因為母語社會地位低落或是錯誤的認為母語影響小孩學業，因而不跟小孩說母語，轉而使用強勢語言和小孩說話；第二個致命傷是學校造成的傷害，學校通常僅以單一語言進行教育，加上對母語不友善，常造成習得強勢語言，卻失去族群母語。簡單的說，世界各地的弱勢族群語言大概都是因為家庭失傳，學校不教，而斷送生命。

許多研究語言復振的學者都同意，弱勢母語傳承最終取決於家長，或兒童的照顧者是否決定使用瀕危語言跟小孩交談，家庭若能持續使用弱勢語言，母語就能安全無虞（Spolsky, 1991; Fishman, 1991; Huss, 1999; Romaine, 2002）。斯波斯基（Spolsky, 1991）認為，家長或照顧者的決定，受到諸多相互衝突因素的影響，他認為需要採取強烈的意識形態立場，方能克服工具性價值的勢力。金恩（King, 2000: 169）指出，意識為語言行為和語言規劃背後的主要因素，是「連接語言使用和社會結構之間的環節」。他還指出，社區存在多種意識形態，因而有著語言政策的需要，語言政策可說是「意識形態戰場上操作的工具」（Shohamy, 2006: 450）。就此而言，弱勢語言生死存亡之戰也是意識形態之戰。

事實上，菲什曼（Fishman, 1991）認為，在實際從事挽救語言之前，有一個稱為「先期的意識形態澄清」（prior ideological clarification）的階段。意識形態澄清——也就是，針對「語言復振為何需要」的問題（the ‘why?’ of RLS; Fishman, 2001: 451），常被忽視，導致許多從事語言復振運動的人士，無法自我證成。

許多語言復振運動忽略這個環節，常導致言行不一，無法堅持信念，造成放棄母語，轉向使用強勢語言。菲什曼（Fishman, 2001: 452-456）指出語言復振所面對的意識形態挑戰有下列五項：

1. 金錢價值（monetary values）對抗族群文化價值（ethnocultural values）和文化民主（cultural democracy）；
2. 弱勢語言的凋亡被視為常態（normality）的意識形態陷阱；
3. 強勢語言愛好和平；語言復振惹事生非（conflictual）；
4. 「你的民族主義比我低劣」的抹黑（your nationalism is worse than mine!）；
5. 一個國家一個語言就足夠（One language per country is enough）。

上述五項意識形態是弱勢語言復振常常需要面對的批評，弱勢族群需要努力的做好自我定位，清楚的解說追求族群文化自主的決心（Fishman, 1991）。這五項意識形態的衝突，也提醒我們在進行語言復振的時候，不能假定語言復振的信念，已經是所有弱勢族群人士的共識，而直接進行復振的工作。雖說求生是人類的本能，弱勢族群在上述強勢族群的意識形態主導下，極有可能導致「母語自殺」，而這表現在將母語流失做為交換強勢語言的文化資本，所必須付出的代價；或是宿命地認為「強凌弱、適者存」，弱勢語言註定要走入歷史，因而失去母語的求生意願。¹

¹ 語言死亡到底是「語言自殺」（language suicide）或是「語言謀殺」（Language murder）的結果？這個問題曾引起學者的爭論，相關討論，請參考貝克（Baker, 1997）、克里斯托（Crystal, 2000）以及愛德華茲（Edwards, 1985）。弱勢族群在強勢語言意識形態的影響下，有著母語自殺的傾向，所以母語死亡應當是綜合自殺和謀殺的成份。

如何激起母語振興的鬥志，並積極投入語言復振，是弱勢語言運動的前置作業。語言復振的意識形態澄清是說服、溝通、對話的工作。語言意識形態的角力，用不著動刀動槍，不過要是沒有做好思想武裝，極易受到主流意識形態的偏見所誤導，終至棄械投降，不戰而敗。

如何看待語言多樣性（language diversity）是這場語言拔河的主軸。語言多樣性可以從「問題論」、「資源論」或「權利論」的角度觀之，而構成不同的語言意識形態取向，進而影響語言政策的形態，產生不同的社會語言效應（Ruiz, 1984）。

雖說語言多樣性自古就是普遍的現象，但是在許多文獻中，語言多樣性常被賦予負面的意象，被視為是障礙，甚至是詛咒，譬如說，聖經中的「巴別塔」隱喻，就意味著破脆、混亂、無法溝通。對多種語言的負面印象，以及之後伴隨的官方語言同化主義，已對世界語言多樣性造成極大的傷害，目前世界語言流失的速度，史無前例。

將語言多樣性視為問題，嚴重的影響語言的保存和發展。我們需要重新構想語言多樣性的意義，喬治·史坦納（George Steiner）（李根芳譯，2007：107）對巴別塔故事的重新解讀，值得參考。他認為巴別塔故事逆轉了更古老、更真實的意義，多種語言不但不是詛咒，反而是「詛咒的相反……因為多語情況而形成的經驗豐富性，思想和情感的創造性，概念的滲透、精緻獨特性，是人類精神傑出的適應能力和優點。」

歌頌語言多樣性是破除強勢語言「魔咒」的好方法。坎多尼（Cantoni, 1997）將多種語言譬喻為「衣櫥」，論證說：（一）

衣櫥裡要有多樣款式的服裝，才能應付不同場合、季節穿著的需要；（二）語言也一樣，多樣的語言能力，能讓我們在面對不同對象、場合、目的選用合適的語言；（三）衣櫃裡，不可能只有一件衣服，只會一種語言，也顯得困窘；（四）語言多樣好處多多，既開闊人際關係，也讓生意興隆，通曉多種語言的學生，不但更加聰明，出路更廣闊。澳洲原住民語言學家謝伯格(Thieberger, 1990: 334) 提出保存族群語言的七項理由，引述如下：

1. 族語是國家的資源；
2. 族語有助於社會整合；
3. 族語是自我及群體認同的表徵，同時聯接族群的歷史和文化；
4. 語言的多樣性包含著不同的哲學觀、科學隱喻、生活方式；
5. 有助於保存傳統文化；
6. 有助於發展認知及健全人格；
7. 有助於實踐社會正義。

弱勢語言復振需要「消解」(unlearn) 強勢族群的單語同化意識，將語言多樣性視為問題、阻礙的偏見，轉化為語言權利論以及語言資源論。對弱勢族群而言，語言死亡迫在眉睫，如果不積極自救，母語必將沉淪。弱勢語言的「末日論述」，並非危言聳聽。弱勢語言復振追求雙語現象，捍衛世界語言多樣性，能夠創造雙贏的局面。不像單語意識形態以零和的方式，造成弱勢語言被取代、消滅。菲什曼(Fishman, 1976；轉引自 Garcia, 1991: 4-5) 提到雙語教育的四項原則，如下：

1. 雙語教育支持弱勢族群的弱勢語言（雙語教育有益於弱勢族群）；

2. 雙語教育有助於穩定社會上的多種語言文化之間的功能互補關係（雙語教育有益於語言學習與語言教學）；
3. 雙語教育表現出支持真正的文化多元論（cultural pluralism）以及發展多元知識以及教育經驗的社會制度安排（雙語教育（也）有益於多數族群）；
4. 雙語教育促進雙語讀寫（biliteracy），使之表述多元觀點（雙語教育有益於教育）。

上述菲什曼關於雙語教育的論述，也適合用來作為語言復振的基本原則。菲什曼強調需要多方設想語言復振的策略，他說（Fishman, 2009：9）：「正當世界的瀕危語言、文化及社區每況愈下的時候，必須從課程、以及課外這兩方面，重構學校，如此學校才能成為母語的益友，不會成為損友，甚或是負面的阻礙。」今年（2011年）剛好是九年一貫母語教育實施十周年，學者的報告顯示族群母語持續流失、轉向使用華語的線性，並未因為實施母語教學有所停歇（蕭素英，2007a；Chen, 2010）。母語持續流失，重新構想台灣的語言復振規劃，刻不容緩。

過去，母語主要透過家庭環境習得，學校則成為現代社會，母語學習的一個重要場所。為了母語復振，學校和家庭必須攜手，合作打造母語浸淫環境，提升語言學習的成效（DeJong, 1998）。菲什曼（Fishman, 1996: 81）曾經問道：「在上學前、在學校中、放學後以及學校之外，你準備怎麼處理母語？」他認為這個問題的回答將決定母語的延續力。語言復振的優先順序是重要的考量，需要秉持「要緊的事情，優先辦理」（first things first）的原則，辨別優先順序，菲什曼（Fishman, 1989: 401）提議說：「為

了瀕危語言進行的語言政策，首先必須確保親密的家庭母語的家庭和個人功能，然後，如果可能，從這裡出發，慢慢的向外擴張，從基本的母語世代傳承機構（如家庭）到次要的機構（如社區以及或許工作場合）。」參考菲什曼的理論，本書提出以下的主要論點：建構家庭、社區與學校三位一體的「母語防護圈」，為當前母語復振運動的核心策略。母語應當從鞏固家庭這個最核心的母語基地出發，然後通過社區與學校的協作，擴充母語的功能，再從社區與學校回歸家庭，促進族群母語垂直的世代傳承。透過統整家庭、社區與學校的「母語防護圈」，可以有效的建構母語實踐社群，給予兒童足夠的母語社會化經驗，所有的母語復振作為，如能與家庭的母語世代傳承連結，就能強化族群母語的永續命脈。

本章前言之後，首先分別介紹世界以及台灣語言流失的現況；接著，探討造成語言流失的成因，然後，說明需要關心語言流失的緣由；更進一步，討論挽救語言流失的方法；最後為本書章節架構的介紹。

貳、語言保存與流失狀況

謝伯格（Thieberger, 1990: 334）認為「語言保存」（language maintenance）有兩種意思：（一）語言保存或流失情形的記錄，以及（二）目的在增進語言保存的活動。前者可以說是「診斷」，後者則是「醫治」。在文獻上，通常將「語言流失」（language shift）和語言保存分開處理，前者指涉語言使用人口、能力或是領域下

降的情況，而後者則指語言人口穩定，老少都能熟練使用並在日常生活領域使用的情形（Baker, 1998）。以下概述世界語言流失的狀況以及台灣族群語言流失的情形。

一、世界語言流失狀況

國外關於瀕危語言狀況的報告，最常被引用的可能是克勞斯（Krauss, 1992）的報告，他指出：全世界的語言目前約有 6,000 種，其中只有 600 種語言安全無虞，換句話說，在 21 世紀末，有 90% 的語言會滅種。兒童不再學習的母語可以視為瀕危語言（endangered language），世界各地瀕危語言有多少呢？美洲有三分之一的語言、澳洲 90% 的原住民語言、蘇聯境內 50% 的語言與北美洲 80% 的語言都瀕臨絕種（Krauss, 1992）。克勞斯論文發表後，語言瀕危、語言死亡的相關研究大量湧現（如 Dixon, 1997; Crystal, 2000; Nettle & Romaine, 2000; Fishman, 1991; Harrison, 2007），這些研究都指出世界的語言以前所未的速度流失，據哈理森（Harrison, 2007）的估計，大約每十天失去一種語言。

語言滅絕的狀況比生物物種的滅絕更加嚴重，不過，卻沒有得到相對的注意。自 1600 年開始算起，動植物滅絕的數量為：484 種動物滅絕，654 種植物滅絕，也就是說不到 7% 的動植物滅絕，與此相比，人類已經有 40% 的語言瀕危（Harrison, 2007: 7）。薩瑟蘭（Sutherland, 2003）的研究也顯示類語言消亡的速度更高於鳥類和哺乳動物的滅絕速度。他的研究同時顯示語言多樣性和物種的多樣性有所關聯（轉引自劉海濤，2006）。斯庫特納伯-

康佳斯 (Skutnabb-Kangas, 2000) 對世界語言多樣性的未來相當悲觀，她說 (轉引自劉海濤, 2006: 47): 「今天，某些語言正在被殺害，語言的多樣性正以有史以來最快的速度在消亡，相比而言，其消亡的速度要大大快於生物多樣性消亡的速度。本書從揭露世界語言「健康」狀況的現實出發，分析了它們在未來幾代人之後的前景。結論是前途一片黑暗。」

二、台灣族群語言的保存與流失

台灣各族群的母語除了華語外，都有流失的現象。據鄭良偉教授的觀察，台灣人母語滅種的徵兆，表現在以下三方面：母語使用的範圍緊縮，使用母語的能力減退，母語失傳 (鄭良偉, 1990)。早在 1980 年代中期，楊永仕 (Young, 1989) 的調查就發現臺灣各族群都有母語移位至華語的現象。後續的研究如黃宣範 (1993)、費佛樂 (Feifel, 1994)、詹惠珍 (Chan, 1994)、曹逢甫 (1997)、聯合報 (2002)、桑德爾等 (Sandel et al., 2006)、蕭素英 (2007)、陳淑嬌 (Chen, 2010) 也都顯示台灣族群語言流失，轉用華語的現象。

原住民族只占台灣人口的 1.7% (黃宣範, 1995: 21)，語言流失相當嚴重。據黃宣範 1989 年對在臺北讀大專的原住民學生做的調查，原住民族語到他們這一代已經流失了 31%，父母那代流失 15.8%。如果將來都是族內結婚，後代會講族語的剩 47.6%，如果是和外族通婚，流失率一定是更加嚴重。原住民的語言可以說已經走向滅種之路 (黃宣範, 1995)。原住民年輕人大多離開部落，進入都市就學、就業，母語保存相當不容易。原住民母語